



論文學翻譯的兩難：以《都柏林人》的中譯為例

莊坤良

台灣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

文學的翻譯，常陷入「美則不真，真則不美」的幻境。忠實與背叛的兩難，馴化與異化的衝突，也因此常成為翻譯討論的焦點。文學的翻譯，到底是要翻「文」？還是翻「意」？還是翻「異」？這涉及我們對翻譯的跨文化認知。從文字到文體，從內容到形式，從意義到風格，文學的翻譯涉及文化的中介，它不同於取得正確訊息為目的的閱讀，它追求美學的再現，因為很多時候它的行式即內容。這種意義與風格的互相滲透，互為表裡，正是文學翻譯困難的源頭。

那麼有沒有可能走出這種兩難的死胡同，追求另一種文化翻「異」的新世界？班雅明的「今生與來世」翻譯論述，呼喚歷史的「未來性」，歷史是永遠的現在式，它導引讀者邁向未來。這段話隱約指涉，中文譯者的使命之一便在於更新中文既有的文字與文化體系。換言之，翻譯就是要翻「異」，要如何把異質文化，透過翻譯的手段，引介、融入並改變中文既有的表現方式。

文學翻譯，貴在其挑戰傳統習慣權威，貴在其顛覆性與開創性的文化新生之潛能。因為翻「異」與翻「新」，翻譯也就特別強調其主體性。譯者必須堅信：自己的譯文即是新的原文。文字一旦翻譯完成，它便在新的文字與文化體系裡，展開生命之旅。缺乏此種翻譯主體性的認識，譯者即失去其作為文化使者的正當性。

這篇論文以本人研究、講授、翻譯、出版喬伊斯的《都柏林人》的經驗為例，說明如何轉「不可譯性」成為文化更新的力量。討論範圍涵蓋書中充滿反諷味道的小說篇名之翻譯策略。喬伊斯是文字遊戲的高手，本文也將舉例說喬伊斯的「誤」寫如何「正」譯？另喬伊斯的寫作，出入聲音與意義之間，玩弄 **palimpsest** 與 **puns** 於鼓掌之間，本文也將討論這些充滿「不可譯性」的例子，如何被開發成一些文字創造的新空間。